

论

LU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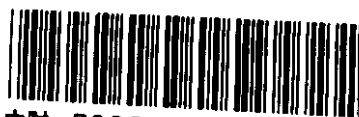
JINGZHENGXINGSHICHANGTIZHI

竞争性

市场体制

吴敬琏 刘吉瑞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财 B0004017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

吴敬琏 刘吉瑞 著

C001.11

中央财经大学图书馆藏书

总号

389735

书号

F014.3/36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

吴敬琏、刘吉瑞 著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激光照排

(北京东城大佛寺东街8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1.25 印张 267000 字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 000 定价: 6.40 元

ISBN 7-5005-1682-7/F·1589

出版说明

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我们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努力创造勇于探索 and 创新的活跃气氛，提倡不同学术观点、艺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提倡同志式的批评和反批评。”（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我们认为，据此出版各种不同观点的学术著作，对于繁荣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是有益的。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科学，必将在各种不同观点的争鸣中获得坚持和发展，并成功地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本书作为吴敬琏同志多年学术研究的成果，全面讨论了如何建立适应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竞争性市场体制的问题。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同志为之作序，发表了重要意见。我们出版这部学术著作，也是希望引起经济学者的进一步探讨，以适应深化改革的需要。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1年8月1日

目 录

序	薛暮桥(1)
前言	(5)
第一章 除了改革, 我们别无选择	(10)
一、改革的必要性来自“球籍”之忧	(10)
二、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难点	(14)
三、危机触发改革, 改革促进发展	(20)
四、双重体制不宜久拖不决	(25)
第二章 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30)
一、什么是改革的目标模式	(30)
二、传统体制的不可行性: 模式转换的最初尝试	(30)
三、改革先驱者的教训	(36)
四、理论探索: 从兰格到锡克	(47)
五、结论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体制	(54)
第三章 中国不能没有生机蓬勃的企业	(58)
一、传统体制下不存在真正的企业	(58)
二、公有制能不能与企业的独立性兼容	(61)
三、大型企业能“私有化”吗	(68)
四、在职职工集团所有和“企业股”的弊端	(70)
五、法人化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新形式	(76)
六、现代化需要企业家	(82)
第四章 竞争性市场的形成	(85)

一、市场机制 ABC	(85)
二、市场的竞争性和规则	(89)
三、加快市场的形成发育	(94)
四、价格改革的战术原则：“管住货币、放开价格” ..	(99)
第五章 宏观调控体系	(109)
一、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	(109)
二、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	(113)
三、计划、财政、税收、金融体制的改革	(116)
四、政府职能转变和为政清廉	(126)
五、新经济体制的总框架	(129)
第六章 改革的战略选择	(132)
一、协调改革的基本战略	(132)
二、对几种局部改革主张的评析	(137)
三、两个基本前提	(145)
四、分歧反映了不同的思想方法	(149)
第七章 行政性分权，此路不通	(154)
一、弊端仅仅在于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吗	(154)
二、财政“分灶吃饭”及其他	(160)
三、再论改革的区域推进	(168)
四、中央——地方关系的规范化、制度化	(172)
第八章 跨越企业承包制	(177)
一、承包能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吗	(177)
二、“包”与“改”的矛盾	(184)
三、这不仅是笑话：非生产性部门的承包制	(190)
四、走出非规范的行政控制	(193)
第九章 利益关系的调整和新利益格局的建立	(198)
一、从“十年寒窗苦，不如个体户”谈起	(198)

二、平等与效率：替代还是互补	(201)
三、与其放权让利，何如理顺基本经济关系	(210)
四、突出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	(215)
第十章 经济改革、政治民主和观念更新	(222)
一、处理相互关系的各种历史经验	(222)
二、经济改革是政治民主的前提	(226)
三、民主的程度与形式受文化水平的制约	(230)
四、改革时期价值观念的更新	(234)
五、现阶段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	(240)
第十一章 农村社会的变革	(247)
一、城乡关系的重新思考	(247)
二、城乡一体化条件下的价格问题	(251)
三、“粮食危机”和土地制度	(256)
四、农村工业的发展模式	(260)
五、工业化过程中的乡村建设	(267)
第十二章 改革时期的发展方针	(274)
一、改革需要宽松的经济环境	(274)
二、稳定成长的战略方针	(281)
三、结构优化和产业政策	(288)
四、改革与开放的关系	(295)
附录：经济体制中期（1988—1995 年）改革规划纲要	(303)
一、中期改革的指导思想	(303)
二、中期改革的实施步骤	(318)

序

薛 暮 桥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是吴敬琏同志与一位青年学者以对话的形式写成的一本新著。由于我目前精力不济，要仔细读完这本书已不可能了，但我与敬琏同志长时期共事，经常在一起研讨问题，对他的观点是了解的，在许多问题上有相同的看法，因此，我完全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也会象敬琏同志的其他著作一样，对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体制改革将发挥促进的作用。

敬琏同志是一位在理论上卓有建树的经济学家，尤其是近十多年里，他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战略和政策等方面，发表了许多独到的、并被实践验证了是正确的见解。在改革的时代潮流中，他的学识和才华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我是 50 年代与敬琏同志相识的，但到相互比较熟悉，经常一起探讨问题，切磋文章，则是 80 年代以来的事情。

50 年代敬琏同志还是一位刚刚跨出大学校门的青年学生，曾经参加过我与于光远同志共同召集的一次理论讨论会，在我的领导下工作过一段不长的时间。他是孙冶方同志的学生，有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不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那种受“左”倾思想束缚的研究中，一般来说经济学工作者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敬琏同志和中国大多数经济学

家一样，冲破“左”倾思想的束缚，极大地解放了思想，并初步显示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社会作用。80年代初，我国经济理论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具有商品经济属性的问题上。当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具有商品经济属性的观点，是要冒政治风险的。那时，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受了苏联教科书的影响，一般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市场调节，更不是商品经济。所以有些经济学家指出，“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就在于以计划代替市场。”这种将计划和市场当作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标准的思想方法，在当时要改变过来是十分艰难的。为了冲破“左”倾思想的束缚，我国的经济学家作了不懈的努力。敬璉同志在这一场关系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方向的讨论中，作出了一个经济学家应有的贡献。

1984年夏，敬璉同志从国外研修回国，即被调到原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后与国务院的另外两个研究中心合并为现在的发展研究中心）。此后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机会多了，也相知更深了。在这一时期里，他经常和我在一起讨论，还陪我去调查、会见外宾。在相当多的问题上，我们具有共同的观点。

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去我们从苏联学来在产品经济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按计划生产、按计划分配、按照计划价格互相交换，只有计划管理而无市场调节。那时虽然也承认还有商品，但认为生产资料等不是商品，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计价等等），而必须由国家来制订计划价格，不能有由价值规律决定的市场价格，结果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明显地背离价值，即使名义上是“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实际上也是抛弃价值规律，因而难免要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提出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

出发，任何经济制度的取舍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为改革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十二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除计划经济外，还应当有市场调节，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迈进了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取消了计划与市场谁主谁辅之分，并明确指出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十三大报告都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这两种形式和手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这样，就把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从旧观念中解放出来了。过去人们都把计划经济理解为苏联式的建立在产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管理体制，十三大报告则提出：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我理解，这就是说要把计划工作从产品经济的基础上转移到商品经济的基础上来。既然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必然有商品交换，也就必然有市场。商品与市场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现在对于商品经济是不是就是市场经济的问题，理论界还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尽管如此，我国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就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价值规律发挥调节作用，这是毫无疑义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所探索的，正是这个问题。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企业和劳动人民都成为国家的主人，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可是我们过去的经济管理体制，使得企业只能吃国家的“大锅饭”，劳动者只能吃企业的

“大锅饭”，却不能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种人工塑造的社会化大生产，不是由有生命力的细胞组成的生动活泼的有机体，而是由没有生命力的砖石堆砌成的不能自我生长的建筑物。现在我们的改革，从根本上讲，就是要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制度，让竞争所引发的活力注入经济生活中来。一方面，我们的改革要有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用经济手段把宏观经济管理搞好。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理顺价格，平整市场，让各企业能够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公平竞争，使竞争方法规范化。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从没听说不靠竞争机制就能使经济繁荣、就能实现现代化的。敬琰同志所著《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的关键含义，我个人认为就在这里。

当然，也正因为这样，敬琰同志的这本新著虽题为《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其实内容涉及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不过其中心思想及贯穿全书的主线，还是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竞争性市场体制，这表明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方向的深刻认识。

对于敬琰同志这本书的某些学术观点，肯定会有不同意见，会发生争论。而争论是好事，不是坏事。不要因为害怕争论，而把自己的意见掩盖起来。争论过程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经济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究竟谁是谁非，可以让实践作结论。我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希望实践能为他的这本学术著作修正错误、充实新的内容。

总之，在学术讨论中，应当鼓励人们独立思考，大胆地提出各自相同的和不同的观点。只有这样，我国的经济科学才能得到繁荣，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才能减少失误，避免曲折。我热切地希望有更多的经济学家能够写出更多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著作来。

前 言

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还是三年前我国经济学界热烈讨论“中期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实施方案的时候写成的。当时，国家体改委委托几位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牵头组成课题组，分别草拟1988—1995年的“中期改革规划”，工作正进入收尾的阶段，刘吉瑞君被国家体改委借调到北京来，参加预定在1988年6月召开的“中期改革方案讨论会”的准备工作。在北京的几个里，他常到我这里来，讨论同这个方案有关的种种理论和实际问题。这样的谈话大约进行了一二十次。本书就是根据这些谈话的记录整理而成的。现在斗转星移，讨论的背景和热点都发生了变化。但是翻阅旧稿，觉得书中讨论的主要问题似乎并没有过时，因此仍然值得将它呈献给读者。

近两年来，对于一些经济学家主张的经济改革“市场取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等的批评，处于经济论坛的中心位置。这些批判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在前几年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种“过分推崇市场机制的危险倾向”，有人“甚至要求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改造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因此，当时那种论调的实质，乃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模式”，“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本书虽然在不少地方谈到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必然具有“市场取向”的性质，但往往只是作为存而不论的前提，而没有对它作

集中的论述，因为既然经过多年争论之后，多数人达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应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共识，经济改革要以“市场取向”，乃是不言自明的。但在变化了的情况下，看来就这个问题多说几句话还是必要的。

目前我国理论界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讨论还在进行。我个人是同意新近有些报刊上发表的、从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的观点的。例如，《解放日报》今年3月2日的一篇署名文章指出：“解放思想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①这里只从改革理论的角度补充几点：

第一，经济体制的基本功能，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运行规则设定，在社会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所说的“僵化模式”）的主要弊病，正在于经常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误配置；据此，改革的根本任务，乃是以一种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的新经济体制取代旧体制。

第二，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为了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在计划指令和市场交换这两种资源配置手段中，应当以市场机制作为基础，也就是说，要通过有宏观管理和计划指导的市场来配置

^① 皇甫平：《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解放日报》1991年3月2日。

社会资源；在我国，实行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体制，被称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第三，无论从辞源上说，还是从语义上说，所谓“市场经济”，都无非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对“商品经济”（列宁）或“货币经济”（马克思）的另一种称呼，所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社会主义有调节的市场经济”。

第四，如果考虑到不受任何行政干预的“纯粹市场经济”是从来不存在的，现代市场经济无一例外地与一定方式和一定程度的宏观管理、计划调节（或称“行政指导”）共存，那么，把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并不会引起“要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的误解。

第五，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不能同“国家直接经营企业”（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语）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兼容的（正如斯大林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国营企业生产的生产资料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而不再具有商品的属性）。但除了意识形态的成见之外，似乎并没有其他的理由足以使人相信，在不同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例如以公有制法人持股为主的股份有限公司）下，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也不能与公有制兼容；所以很难认为，“市场取向等于资本主义取向”是一个已经得到科学证明的论断。

与此相联系的，是对于1989年东欧剧变的原因的分析。在有些同志看来，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丧失，可以溯源于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因为实行市场经济（无论是“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可调节的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哪怕否定的只是“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必然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和资本主义的复辟。

这种论断是否符合实际？近几个月来我国专家对此作过深入的讨论。有关文献甚多，这里只引述一次高级研讨会的纪要，来

看一看“若干有一定理论素养，又对国内外实际情况了解比较深入的专家学者和实际部门的领导干部”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1年第2期）。这些专家和领导干部对苏联和东欧各国情况作出的总的判断是：由于理论上和实践中的缺陷，这些国家虽然经历了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的“改革”，到80年代末，各国的情况仍然是“市场极度不发育，管理体制僵化封闭”。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在减少或取消指令性计划指标以后，由于缺少完整的市场机制，企业自主权和宏观间接调控二者都将落空。又正是因为经济工作没有搞好，才导致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交织。”另一些国家在“完善计划”上下功夫，但是，正因为这些国家的市场极度不发育，没有市场环境，价值规律无从表现，所谓“计划要尊重价值规律”只不过是一句口号，“计划没有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效果，反倒成了僵化经济的桎梏，是导致社会经济政治危机根源之一。”我认为，这种分析是实事求是、有理有据的。东欧剧变固然有复杂的外部因素，但不能否认，毛泽东所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①，在这里是适用的。正像列宁所指出的：“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②离开了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侈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完全文不对题的。而离开了竞争性市场体制的建立，要想改善社会主义经济的效率状况，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本书所记录的对谈，是环绕着如何建立适应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竞争性市场体制这一主题进行的。它涉及许多复杂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

的问题。我们现在把自己千虑之一得发表出来，是希望引起有志于振兴中华的经济学者的讨论。由于情况的变化，本书根据两、三年前的情况作出的某些论断已经过时，同时从现在的眼光看，书中认识肤浅、需要改善的地方所在多有，这是要请读者鉴谅的。

吴 敬 琰

1991年5月31日